

胡艳丽

黄河奔涌,故事不息,文化不息。

杨明所著的《黄河简史》以奇丽的神话开篇,将黄河奔涌恣肆的历史与中国的传说、文化、历史杂糅在一起,引领读者重回大河“源头”,乘着黄河波涛,在数千年的人河交战与交融中,感受那些惊心动魄的大河往事和华夏故事。

所谓“三十年河东、三十年河西”,正是历史上黄河河道摇摆不定的真实写照。书中,作者以黄河历史上的五次大改道为轴,串联历代黄河治理及与之休戚相关的治河人物、帝王将相。整本书读下来,正如黄河九曲,风景百转。

禹的大河之治在上古时期,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令今人难以分清何为真实、何为梦幻,但禹河故道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仍有迹可循。作者指出,禹的治河是在父亲鲧“围堵障”的基础之上,再勘地形、测湖泊,因势利导,疏堵结合,“左准绳,右规矩,载四时以开九州,通九道,陂九泽,度九山”。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,形成的禹河故道,稳定了相当长的时间。随着黄河携带的泥沙不断淤积,黄河在春秋时期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大改道,向东南方向平移了一百公里。

行笔至此,秦汉时期的天河之治已经呼之欲出,频繁摆动的河道导致河患不断,不仅两岸百姓朝不保夕,农田灌溉和水运系统也受到了威胁。秦统一天下,除了修万里长城之外,还为黄河修筑了千里长堤,此举一度缚住了桀骜不驯的大河,在秦的兴衰及大汉初兴之时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千万不要以为,治理黄河仅仅是人与自然的抗争。作者在书中,一再指出当人类的活动足以影响自然,当政治的因素影响了当政者的决策,黄河治与不治,怎么治,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水利问题,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,有时是扯不断理还乱。汉武帝因当权舅舅的私心,而一再贻误治河之机,导致黄河泛滥多年,直至舅舅死后,才下定决心治河并亲自参加堵口。待到西汉年间,王景受命于危难,“商度地势,凿山阜,破砾绩,直截沟涧,防遏冲要,疏决壅塞,十里立一水门,令更相洄”,开启了安流千年的传奇。

黄河携沙漫道,带来了多少人的生死荣辱?贤臣纵有治河之能,尚要有当政者的识才之眼,还要有风清气正的政治风气,以及丰厚的国力、财力支撑。在社会的平稳期,大河治理成为官员宦海沉浮的杠杆,有人借治河谋利,有人因治河含冤,有人平步青云,有人饱尝世事冷暖。一旦遇到战乱,大河治理便与战争搅到了一起,大河既可是守方的盾牌,也可是攻方的千军万马,还有人借扒开堵口之机,自己脚底抹油,“水遁”而去。

作者将数千年治河故事娓娓道来,纵横勾连,经纬交错,涛声、风声与人语声声声相和。时光流转,故事成了时光的波纹,黄河自顾滔滔,转瞬来到了民国,人们大多忘记了历史上那些治河名臣,他们是贾鲁、刘大夏、靳辅等,他们上马能武、下马能治、提笔能文,只可惜他们的星辉在历史中即将消逝殆尽了。

民国之时,西学东渐,那个最混乱、最癫狂的历史时期,大师辈出。听闻辛亥革命,一位愤怒的青年,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,匆匆从德国赶回国。可当他回来,战事已停,北洋政府成立了,他扒了个空。只能转道离国,当他再次归来时,已学得一身水利知识。这位热血青年就是李仪祉。他先创办水利专科学校,教书育人,融汇中西,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水利人才;后出任新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,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,提出解决泥沙问题的途径——上、中、下游统一治理,并首次提出治理黄河的重点应放在西北黄土高原上。李仪祉后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,两袖清风干事,修建泾惠渠福荫一方百姓,一渠建成再一渠,在那期间,规模宏大的“关中八惠”灌溉工程全面建成。

《黄河简史》从大禹治水、王景开安流的千年传奇,再到李仪祉的大河之治,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黄河治理,如数家珍,其中有叹息、激赞、怜恤,也不乏愤怒和调侃。俱往矣,今天的黄河治理,还要看这一代的风流人物。中华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不息,与大河恢弘的变迁治理辉映如歌,这一部《黄河简史》可谓精彩纷呈,多少帝王逸事、名臣风采、市井百态,以及近现代的国家荣辱尽在其中。掩卷回首,中国人治河的风采,都凝缩成了大禹举起的开山巨斧,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。

(《黄河简史》杨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

郑从彦

大家都在读齐白石,读齐白石的画笔,感受妙趣横生;读齐白石的画跋,参悟文字奥妙;读齐白石的篆刻,欣赏红白之趣,无人不企求在这位大师身上,能一窥绘画的堂奥。

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工作者,动画短片《三个和尚》的创作者韩羽先生也是齐白石的忠实粉丝。作为一位“九〇后”,虽年事已高,却对艺术永葆初心。韩老从齐白石画作本身切入,由画理推及文思,由艺术观照人生,“玩之不觉为倦”。

艺术的根本在有意味,而创造一件艺术精品的秘诀,在于寻得生命经验和文化经验。白石老人的画作,恰是将两者完美结合并用艺术的形式进行呈现。白石老人画柴筢(接柴拾草之农具),表面看来最是简单,最容易画,实则却最难画。在“难”与“易”的博弈中,白石老人化险为夷,让俗物登上了大雅之堂。

在韩羽看来,白石老人是“简”“繁”转换的高手:“白石老人画柴筢,允称涉险而又能化险。柴筢就器物讲,应说‘简单’;从绘画讲,又应说实不‘简单’。看那弹性的筢柄,硬挺的筢齿,不同部位的不同质感,在显示出画中柴筢的‘简单’中的‘复杂’。表明了白石老人不仅面对复杂的事物能从‘繁’中看出‘简’来,删繁就简;而且又能从‘简’中看出‘繁’来,因为任何事物,简单中都蕴含着复杂。”除却时空的差异,两位老人在艺术上完成了对话和共鸣。艺术的魅力,生命的活力,也恰恰应了郑板桥的论画名言——“画到生时是熟时”。

人言作画贵在画龙点睛,读画的重点也恰在轻轻一“点”,一击而中。观《小鱼都

来》,韩老认为没有钩的钓竿颇堪玩味。在人看来,钓鱼之乐,在闲情逸致,在消烦解闷;可在鱼看来,那是充满杀机,是大祸临头。“没有了钓钩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。”在齐老的画里,韩老看到了人鱼和谐,其乐融融。赏《牧牛图》,韩老指点小友细看缰绳。“那缰绳是弯曲着哩,还是直着哩?”小友顿悟:这拽直了的缰绳,就是那个“急”字的形象化,牧童急着往家里走,因为他知道祖母和母亲在惦记着他。在韩老心里,白石老人手上握的定是一支神笔,其在直白和含蓄间游走,既让画作一目了然,又令观者玩味不尽。韩老慨叹齐白石的画有如白居易的诗,“用常得奇”,看似稀松平常,其实内有乾坤。

中国画,文画互动,画之趣常与文之巧妙,桴鼓相应。提到齐白石的讽喻人世丑恶的画作,总绕不开《不倒翁》与《他日相呼》。在韩老看来,《不倒翁》是“以丑对丑”,画中的形象是小丑,诗文“通身何处有心肝”则将那小丑剥皮抽骨,使之愈见其丑;而《他日相呼》是“以美对丑”,宠物千丑事——偷吃,有“卿本佳人,奈何做贼”之憾。白石老人加了四字“他日相呼”,不禁让人深思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”。寥寥几笔,可数之字,小中见大,直击人心。

韩羽先生读齐白石画作后作50篇文。一画一文,文画相生,文画之后,哲思满满,常言道,熟能生巧。可韩羽却曰:“生”也能生巧。”因为“齐白石作画,不囿于成法,不落方隅,总是能出新招儿,给人以意外、以陌生新奇之感,质以传真,吐吐有神”。这样的思辨,也恰恰应了郑板桥的论画名言——“画到生时是熟时”。

老憨

前几年读过管弦的《药草芬芳——发现中医药之美》(人民出版社出版),被她笔下灵动的药草、优美的文字深深折服。听闻她的新书《毒草芬芳》上市,便第一时间入手了一本。

拿在手里,足足的16开本,厚重、大气。封面鎏金、色彩艳丽。内封黑底,衬着“毒草芬芳”4个白字,似乎在诠释“毒草”的内涵。快速翻阅全书,50篇文章,50味有毒的药草,每一味都配了一页精美的手绘水彩画。摩挲在手里,美美的感觉,让人抑制不住一口气读完的欲望。于是,一个下午就在阅读中轻松度过了。

诚如作者所言,这是一本发现有毒药草魅力的书!

但掩卷遐思,作者游刃于这些有毒药草的特性、功用和历史、传说中,优美的文字如行云流水一般,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?她所说的毒草魅力又是什么呢?

在一些人的记忆中,“毒草”这个词有些吓人。因为它被人们赋予了一些本不该有的含义。在管弦的书中,毒草只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客观存在,跟人类及各类飞禽走兽一样,是生命体的不同形式。书中的毒草,有的全株有毒,有的部分有毒,有的只是有毒副作用。它们都是一些很纯粹的植物。这才是对“毒草”的正解吧。

毒草是可怕的,因为它会要人命。书中有很多故事,都说明了这一点。如南唐后主李煜死于牵机药(马钱子),炎帝神农氏和战国时的韩非子均死于钩吻(断肠草),《水浒传》中的蒙汗药(曼陀罗)动辄将人撂翻,然后就有了杀人越货的勾当。这样的毒草,毒得惊心动魄,毒得祸国殃民。

毒草也是可爱的,因为它能救人。通过专业而严格的方法精心炮制,马钱子能治疗风湿顽痹、麻木瘫痪、痴症肿瘤等症;乌头有强心作用,甚至可以“回阳救逆”;钩吻也可“破癥积,除脚膝痹痛,四肢拘挛,恶疮疥虫”。这样的毒草,毒得神奇巧妙,毒得利国利民。

害人的毒草和救人的药草能够完美地统一于一体,这就是毒草的独特!还有一些有毒的草,对一些生命体有毒,而对另一些生命体无毒,比如雷公藤,对人、犬、猪及昆虫有大毒,但对羊、兔、猫、鱼无毒,这就是毒草的趣味。

中国传统医学中的“以毒攻毒”,说的就是毒草的价值。相对于人类给有毒药草打下的种种恐怖的标签,《毒草芬芳》想告诉我们的是,毒草是无辜的,害人的是人,吓人的也是人,都不是草。毒草是自然界中的一类存在,只要你不去故意招惹,它们就不会伤害你;只要你懂得并善待,它们就会给予你足够的回报。

发现毒草的魅力,让人心得毒草,趋利避害,成就了这本书的魅力。

(《毒草芬芳》管弦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)

感受毒草的魅力
——读管弦《毒草芬芳》有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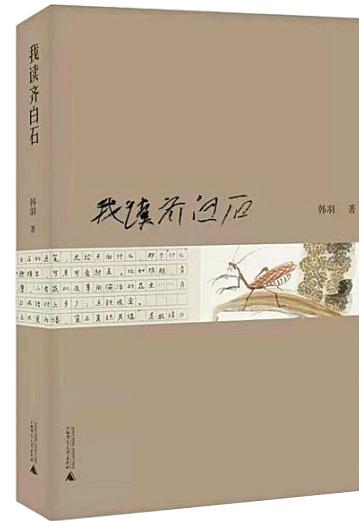
读有所得



我读经典

会心处不必在远

——谈谈《我读齐白石》一书



李慕尚

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,三位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。航天员王亚平出征前答应5岁的女儿,要为她和她的同学们“摘星星回来”。同日,有网友拍到了神舟十三号划过北京上空。神舟十三号,在一片星河中熠熠生辉,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!

这份心中有日月的浪漫,让我想到了李白的《夜宿山寺》:“危楼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。”

突然有了去翻翻《古典诗词艺术探幽》的冲动。这本封面满是艳丽桃花的书,是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,作者艾治平。这本书,也是我对古典诗词爱好的一个启蒙,在我心中一直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。

由于时间较为久远,书已经有些发霉发黄了。看到今天外面阳光灿烂的样子,于是有了把一些旧书清理出来晒一晒的冲动。阳台防盗窗正好伸出去有五六十公分,找来了几块厚纸板垫在下面,10几本书就这样一字摊开了来晒。也记得有人说过,其实书不用晒在阳光底下也是可以的。

我其实不算是一个真正爱书的人。由于家里房子面积不大,不少的书,还来不及等它霉变,就被我扔了。但是,这么些年过来,总有那么几十本书,是我舍不得扔的。

晒书,是一种个人行为,但其实也是一种集体行为。从媒体上得知,今年,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,国家图书馆(国家古籍保护中心),就在全国广泛开展了“诗书继世,察古知今——2021年中华传统晒书活动”。北京市西城区,也在今年的10月10日,开展了“初秋西城美,书香溢满城——第四期晒书节活动”。类似这样的一些活动,给那些爱书惜书的人提供了晒书换书、交流心得、推荐好书、爱心捐赠的平台。

有人说晒书的“晒”,是从英文的“share”音译过来的,也即“分享”的意思。但其实晒书,源于中国代代相传的生活习俗,是中国特有的读书文化。晒书,又可作“曝书”。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《穆天子传》中就有“天子东游,次于雀梁,曝书于羽林”的记载。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云:“七月七日,曝经书及衣裳,不蠹。”这说明魏晋时期我国就有了晒书的习俗。

南朝时期的小说集《世说新语》,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相传晋朝有一位叫郝隆的文人,在七月七日这天,富豪们都在室外阳光下晒鲜亮华丽的衣服和昂贵的财物的时候,他索性解开衣带,把自己的肚皮露出来“晒”,当别人问他在晒什么的时候,他淡定地回答:我在晒书呢!除了《世说新语》所讲述的郝隆的故事,在很多名著中,我们也能看到晒书的情节。比如四大名著之一的《西游记》里,曾记载过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来路过曝晒山,结果遭遇暴雨,经书被大雨淋湿,于是乎师徒们将经书放置在山顶上的石板上进行晾晒。

我国古代各地晒书节的时间并不一致,除了上面说的七月七日这天外,也有说是六月六日的。与郝隆相似的是,康熙年间,著名学者朱彝尊满腹经纶,他在六月初六这天袒肚露胸晒着太阳,谓之晒书,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见。后康熙经与之交谈和面试,封其为翰林院检讨,负责撰修明史。此后,读书人都要在这一天晒书诗,晒字画,就叫作“晒书节”。清人潘平隽有《六月六日晒书诗》,诗中写道:“三伏乘朝爽,闲庭散旧编。如游千载上,与结半生缘。读喜年非蠹,题惊岁又迁。呼儿勤检点,家世只青毡。”我们看到了如他这样的读书世家(“青毡”),长辈们领着子女晒书的情景,历历如在眼前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,人们的阅读习惯在改变,看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,很多晒书的习俗也就慢慢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不过,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,近年来各地举办的晒书活动在不断地增多,晒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了,参与晒书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古人真诚爱书、惜书之情确实是应该代代相传的,因为书中也有着日月星辰般的浪漫。而晒书本身,其实也是一种文化、一种值得我们不断传承和保护下去的习俗。



《百年巨匠:校园版·鲁迅》

范迪安主编,郭征南著,山东美术出版社

鲁迅,这位著名的文学家,曾被誉为旗手、战士、孺子牛、民族魂。他的作品曾大量被选入教材,拥有广泛的读者。关于鲁迅的出版物举不胜举,这本小书下了大功夫,简洁、丰满、有趣地重构了一个鲁迅。

本书从这些经典的代表作而延伸讲解了他一生的奋斗与追求,通过一个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小故事,呈现了一个可亲可敬的鲁迅,拉近了一代文学巨匠与小读者们之间的距离。作为面向学生的读物,该书语言活泼、图片丰富,以多样化的表现形式,全方位地引导孩子们充分领略鲁迅的人格魅力,深入体会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内核,使小读者们得到优秀文化的滋养。



《深海浅说》

汪品先著,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

深海,是新世纪谈论的新题目。大海究竟有多深?深海中有生物吗?深海的底部是什么样子的?

地球上97%的水集中在海洋里,而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的71%,但直到20世纪后期,人类才开始真正深入海洋内部。本书以深海研究的历史为线索,介绍了海底的热液与冷泉、地震与火山、矿物资源与生物圈等基础知识,并通过海洋与地球板块运动的关系、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规律等宏观问题的讲解,说明海洋对于地球、对于人类自身的重要性。全书以富于趣味性的事例和严谨的科学理论,深入浅出地解说海洋科技与海洋文化知识,并展现了人们探索海洋的智慧与勇气。

